

谈兵论道

# 向毛泽东学习战略管理艺术

■张丙辰 黄立彬

要点提示

战略管理是对全局的、长远的战略性问题的决策和管理，是旨在解决本组织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管理艺术，主要包括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等环节。战略管理是最高层次的管理，是着眼全局的综合性管理，是面向未来的长远性管理。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战争频繁发生、战略对抗激烈、战略管理要求极高的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家、战略家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导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战争活剧。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以其恢弘视野、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略管理的成功范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管理艺术。

## 增强战略管理的前瞻性预见性

战略管理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前瞻管理，准确的前瞻性预见性是战略管理的内在要求和理想境界。高明的战略管理，必须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洞悉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见事早于对手，行动先于对手，以先手先机赢得与对手博弈的主动权。战争的特殊性复杂性残酷性，决定了战略管理是一种风险很高的管理，必须具备很强的前瞻性预见性。毛泽东认为，“描画战争趋势的轮廓是必需的可能的”，并多次强调军事预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在战略管理上的前瞻性预见性，一个重要表现是善于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从而为战略行动提供科学的方向引领，并据此提前做好力量预置。

善于进行战略前瞻和预判的人，就像屹立于高山之巅的巨人，目光远大，见事之于未萌；又像出没于山林之中的猎人，灵敏机警，察于秋毫之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战略眼光远大、战略洞察敏锐的战略管理者。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们把握现实、未来贯通起来思考，形成对战争问题、战略问题的全局性认知；能够在复杂的战略博弈中，把握战略全局，预测发展趋势，预估行动风险，作出战略预置。在抗日

战争初期，当人们对战争前景迷茫困惑、“亡国论”和“速胜论”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通过系统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略判断，为处于黑暗中的国人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从毛泽东战略管理的成功实践可以看出，战略管理前瞻性和预见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基于对事物发展方向、可能结局以及风险挑战的科学预判，制定战略目标、设计战略布局、选择策略方法，从而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和主动。同时，在战略管理实践中，还必须跟进做好基于科学预见的战略预置，提前在关系全局的重要方向和关键领域排兵布阵。历史和实践表明，战略预判越准确，战略预置越到位，形势发展的主动性可控性就越强，战略管理所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就越明显。

## 关照战略管理的整体性关联性

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也是共产党人观察战争、认识战争、驾驭战争的方法论。在战略管理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整体性关联性是毛泽东战略管理的重要特征。他认为，思想和决策问题应着眼于战争全局，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主要方向、重要支撑的突破推动全局的发展，并以全局的发展映照其他方向的发展；注意增强战略行动的整体协调性、前后一致性和内外互动性，使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相互支撑、良性互动、合力致效。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战略管理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性关联性特征。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把整体性思维、矛盾论方法、联系性原理，运用于战略管理之中，始终把中国革命战争作为一盘大棋来思考、一个整体来筹划，其高屋建瓴的全局统摄、神来之笔的战略布局、遥相呼应的配合联动，无不展现出一个伟大政治家、军事家炉火纯青的战略管理艺术。1946年6月底，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以各解放区战场的整体联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与此同时，为配合前线作战，我们党在广大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为前方军事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在国统区组织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罢教、罢工斗争，成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形成了两条战线遥相呼应、相互配合的生动局面。总之，从战略管理的视角看，毛泽东在各主要战场和主要工作的战略安排上，既相互策应又浑然一体，既突出重点又算无遗策，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超的战略管理艺术，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所体现的整体性关联性思维及其成功实践，在战略管理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成功的战略管理者，必须对战争全局有一个整体性把握、综合性设计，任何局部都要围绕全局、纳入全局、服务全局；必须善于找准决定战争全局的主要矛盾及其制约因素，以精心设计的战略布局和系统内诸要素的良性互动，推动主要矛盾的解决，进而达成战略性目标，保持战略性主动。

## 强化战略管理的灵活性创造性

俗话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略管理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在战争指导和战略决策上必须因时因势而变，方能保持战略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管理被看作是“对应变化的艺术”。毛泽东战略管理的灵活性创造性特征，是指他在进行战略管理过程中，总是基于效果而不

是经验或教条来制定战略指导方针。当形势任务或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他总是善于以应变变，及时对战略指导方针作出调整。

在战略指导上，毛泽东从来不拘一格，强调一切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出发，主动灵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迫使就范，利用敌人的一切矛盾，孤立打击敌人，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思维品质，学贯中西、融通百家的深厚学养，使毛泽东在战略管理上获得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表现出鲜明的灵活性创造性。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战略管理上的灵活性创造性，愈是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表现得愈加明显。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主张在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党应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共御外侮。通过有条件的释放蒋介石，使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促进形成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阶级矛盾再次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1945年8月，面对波诡云谲的时局，毛泽东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作出赴渝谈判的重大决策，并最终达成《双十协定》。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它不但表现了毛泽东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高度历史自觉，而且表现出主动塑造态势、引领历史发展的主动创造精神，是其伟大革命生涯中体现战略管理的灵活性创造性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例。

毛泽东战略管理的灵活性创造性，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客观规律性的有机统一。理解运用好这一战略管理艺术，需要把握三个关节点：一是任何战略管理上的灵活性创造性，都必须从既定的、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离开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条件，战略上的灵活性创造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实现战略管理上的灵活性创造性，必须敢于摆脱一切先验的甚至是经典的思维观念或既有模式的限制束缚，倡导培养实事求是的开放灵活的思维方式。三是实现战略管理上的灵活性创造性，还必须善于洞察趋势双方时与势的微妙变化及发展趋势，找准用好能够扭转乾坤的战略支点。

## 群策集

主攻方向，是集集中主要力量和打击效能实施重点作战的方向，选准主攻方向，是指指挥员定下决心的核心内容，对达成作战目的具有决定性影响。信息化条件下，主攻方向的选择应确保有利于实现作战目的、有利于达成作战突然性、有利于推动战局发展。

立足“首战必胜”。应着眼开局有利、形成于我有利战局、快速实现作战目的，精选慎选主攻方向。1955年筹划一江山岛战役时，围绕“先打一江山岛还是直接攻打大陈岛”争论激烈。张爱萍等指挥员通盘考虑，选择先打一江山岛，首战则胜，给敌以强烈震慑，有力地推动了战局朝我有利的方向发展。逼退大陈岛之敌撤退，提前、快速达成了作战目的。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节奏加快、前后方模糊、发现即摧毁、首战即决战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更需要指挥员围绕慎重初战，恰当选择主攻方向，力争一举歼灭或瓦解敌作战体系、打乱敌作战企图、破坏敌战役布势，形成有利态势，确保首战必胜。

着眼“小战即胜”。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越来越重视作战性价比，小战而胜甚至不战而胜是作战双方追求的目标。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双方体系特征越来越明显，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背景下，许多要害目标往往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应把主攻方向选择在体系中高价值目标部署位置上，如对整个作战力量系统功能的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指挥控制子系统、作战中起支撑作用的制信息力量、制空力量、资源保障力量部署位置等。对这些目标的打击往往能起到“毁一点而瘫全身”的作用，实现一击必中。小战则胜，大大提高作战的性价比。如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不论是空袭阶段还是地面战斗阶段，都是先从打击敌指挥控制信息系统部署的位置入手，使伊军从最高统帅部到战区司令部都成了“聋子”“瞎子”，结果指挥失灵，军心涣散，很快使全军覆没。

围绕“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在漫长的战争史上，隐蔽突然、出奇不意创造了无数的战争奇迹。因此，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主攻方向的选择应打破常规，着眼出奇不意、攻敌不备，选择在敌意想不到的方向，以达成作战突然性，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快速改变战局、实现作战胜利。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避开阿军重点设防的斯坦利港，选择在阿军意想不到的圣卡洛斯港方向实施登陆，让阿军始料未及，直到英军登陆五个小时之后阿军才发现，英军登陆作战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瞄准“兵弱地弊”。主攻方向的选择还应考虑作战环境的利弊、作战力量的强弱等客观条件。综合衡量敌情、敌情、民情等客观条件，选择敌最弱的方向实施作战。如定陶战役中，刘伯承全面分析徐州、郑州、虞城三个来敌方向后认为：郑州方向敌整编第3师地形不熟、情况不明，便于我设伏分割，且该师连战疲惫、战斗力下降。最终以郑州为主攻方向，取得战役胜利。因此，信息化条件下主攻方向选择应力争着眼要害、

# 如何选择信息化条件下主攻方向

■危骏 郝征兵

弱处开刀，力争选择在敌人暴露翼侧或间隙、兵力薄弱或空虚、作战盲区、地形不利或武器性能发挥等位置，才有可能达成作战目的。

有利“作战接续”。主攻方向还应着眼全局，选择有利于我方优势兵力运用以及便于后续作战展开以及下个阶段作战战略衔接。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同志在战役筹划之初就明确了关门打狗的战略方针，将拿下锦州作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事实证明，选择锦州攻克锦州这个敌防御要点，激活了整个东北战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一步。因此，未来作战不能只考虑局部利益的得失，应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深谋远虑，才能在跌宕起伏的战争中创机遇、赢得主动、取得胜利。

# 战法创新应“有的放矢”

■高凯德

## 挑灯看剑

备战打仗，战法创新不可缺。应将战法研究做为必修课，深刻把握战法研究精髓，紧贴对手、因情而谋，真正做到常研常新，确保战之有法、胜敌一筹。

因敌而新。没有具体敌情的战法创新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战法是针对敌方力量现状、敌人作战对策采取的反制方法，应具有极强的指向性、对抗性、时效性。因此，战法创新须因敌而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跟踪最新敌情、了解对手动态、预测发展动向，以变制变。适度前瞻、超越对手。用前瞻的视野，敏锐捕捉新技术、新装备对未来战争的冲击，描绘未来战争蓝图、预测对手行动、突破固有理论束缚、提出新的作战思想、前瞻创新“剑法”体系，从而全面超越对手。另辟蹊径、以弱克强。应瞄准现实或潜在对手，寻找其作战体系中短板弱项，运用非对称思维，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寻找敌关键要害，避实击虚、以弱胜强、以能击不能。

因案而新。战法创新应结合自身实际任务，才能有的放矢。思想主导战法，战法服从任务。在创新战法时，应结合具体任务，深化战场

客观规律认识，针对不同作战样式、不同作战地域的地形特点，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引领战法创新深化细化。围绕战法提出能力需求，按照能力需求量化具体指标，结合敌我双方发展变化，不断论证完善能力构成的相关内容，去伪存真，实现滚动发展。根据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需求，系统梳理各个作战编组、各个作战时节的具体行动内容、行动流程和行动方法。按照体系作战思想，把各类作战行动放在上级编成内、作战大体系中去统筹谋划，最大限度地发挥体系作战效能。

因技而新。装备技术发展是战法创新的重要灵感来源。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武器装备发展日新月异，应准确把握军事技术发展新趋势，才能以更宽的视角、更高的站位创新战法。强化创新思维、摆脱惯性思维，强调技术思维、摆脱传统思维，不断强化各级指挥员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认识，实现装备与实践的完美融合，只有这样才能紧跟新技术、革新战法、研究新战法。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运用模拟仿真系统、兵棋推演系统，对所创战法进行模拟推演、科学评估，使之更为实用精准，改变以往重定性、轻定量的做法，实现精确性研究与模糊性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统一。

# 让技术认知力为胜战筑基

■邓斯佳 杨金杰

## 观点争鸣

●科技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军队未来和战争胜负，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强军胜战的强力支撑。

所谓技术认知力，是以推动科技创新和运用为指向，对技术的性能功效、价值作用及发展趋势的认识和把握能力，突出体现为对技术的敏感度、理解力、甄别力、驾驭力。当今时代，科技正成为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科技含量成为衡量军队建设质量的关键指标。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果技术认知力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就难以以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注入动力，也就难以赢得制胜未来的重要砝码。

提高技术认知力，不仅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应答题”，更是每名官兵的“必答题”。从技术价值效能的实现过程看，如果说技术的发明创造是“一次赋值”，那么技术的有效运用就是“二次赋值”。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有赖于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拓宽知识视野、紧盯科技前沿，不断在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技术的研发上取得新突破，以更多军事科技领域的新发明新创造，提高对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增

长的贡献率，积极抢占军事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有赖于广大官兵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加快知识更新、提高科技素养，以对科技的科学认知、透彻理解，去提升和挖掘技术的应用价值，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实实在在的战斗力，在更高起点和层次上提高备战打仗能力。显然，从科技创新到科技运用，是一个紧密衔接、相互促进、聚向发力的“赋值”过程，是一个谋求科技制胜、更大程度释放技术作战效能的过程，而技术认知力是贯穿其中彰显人的能动作用、创造才能的内在支撑。要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我们既要政治头脑、军事头脑，也要科技头脑。科技素养、科技头脑以技术认知力为基础和底蕴，技术认知力越高，运用科技的创新创造力就越强，促进战斗力增长的效应就越大。

提高技术认知力，不仅是驾驭现代化武器装备之要，更是加快推进军事理论及作战理论创新之举。随着军事技术特别是信息、智能、隐形、无人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武器装备高新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且各型武器装备之间的关联度、耦合度越来越强，体系运用特点越来越突出。从现实看，技术认知力不足是制约武器装备掌握和运用

的突出短板，甚至会出现部队演训离开厂家技术人员伴随保障就“玩不转”的现象。面对武器装备发展的新常态，从熟练技能到发掘潜能，从增强体系化运用效能到提升实战化运用能力，都离不开通过提高技术认知力，进而实现人与武器装备有机结合并获得作战能力新的“增长极”。还应看到，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向军事领域渗透，新的军事技术形态加速推动军事理论和军事理论形态的重构，带来军事科技与军事理论的深度融合、深度融合，使技术认知力成为新的作战理论的“催生剂”。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对航空技术的透彻认知力，便不会有制空权等空战理论的产生；如果没有对信息技术的透彻认知力，便不会有制信息权等信息作战理论的产生；如果没有对空间技术的透彻认知力，便不会有“高边疆”等太空作战理论的产生。同样，当下如果对人工智能具有的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自主操控等新特征缺乏透彻认知，就创造不出智能作战、无人作战等新理论新战法。有了技术认知优势，才能真正把军事技术优势转化为理论引领优势，直至战场制胜优势。

提高技术认知力，不仅是甄别技术真伪、谨防技术欺诈之策，更是敏锐洞察军事科技发展趋向走势之需。值得高度警觉的是，西方媒体常常宣

传炒作一些所谓的新技术新概念，玩弄似是而非的障眼法，如果缺乏甄别力，辨不清真伪，听风就是雨，就难免落入他人设置的技术陷阱，造成被动局面。当年，苏联被美国搞的“星球大战计划”牵着鼻子走，被美国人的大肆渲染、故意欺诈弄得晕头转向，最后影响了整个军事作战能力建设，教训极为惨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必须保持高度的技术敏感度和洞察力，认清军事科技发展的主导方向和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武器装备向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不断涌现的颠覆性技术正深刻改变战斗力生成模式，高新科技的新突破将加快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发展的趋势，那些“改变游戏规则”的军事技术将加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嬗变的趋势，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的趋势，努力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下更大气力推动科技兴军。惟有善于从技术变革视角去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从科技因素影响去认识和把握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规律、制胜机理，从挖掘技术效能去寻求作战理论和战法创新的突破，才能推动科技兴军精准落地、有效落实，为我军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夯实基础、增添底气。